

法国共产党史

第二卷

从1940年到解放

(供内部参考)

世界知识出版社

3
2
8

法 国 共 产 党 史

第 二 卷

从 1940 年到解放

北京編譯社譯

(供 內 部 参 考)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1966 年 · 北 京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TOME II

DE 1940 A LA LIBERATION

Editions Unir, Paris, 1962

根据巴黎联合出版社 1962 年版译出

• 供内部参考 •

法国共产党史

第二卷

从 1940 年到解放

北京编译社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交道口南三条三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五) 1.00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7\frac{3}{8}$ · 字数 169,000

1966 年 3 月第一版 1966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03·52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往事一瞥.....	4
第二章 占领时期的头几个月.....	19
第三章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诞生.....	38
第四章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袭击.....	58
第五章 1942年——决定性考验的一年	73
第六章 阿尔及利亚的跳板作用.....	93
第七章 科西嘉岛的解放.....	106
第八章 参加临时政府.....	115
第九章 迎接第二战场的开辟.....	123
第十章 解放战斗.....	136
第十一章 巴黎自我解放.....	146
第十二章 在本国土地上的最后战斗.....	162
第十三章 关于参加政权.....	171
第十四章 从解放到第十次代表大会.....	194
第十五章 第二卷的结束语.....	211
大事记.....	224
参考书和资料.....	231

前 言

这部法国共产党史的第一卷是公开发行的，因为它涉及的是众所周知的 1940 年以前的那一时期的史实，对于现行政策已經沒有多大影响。

在那一卷里，我們只是重述了一下事实，同时去掉了所有与事实毫不相干的附加成分和伪造成分。

第二卷是专供共产党人閱讀的，因为这里揭示的某些較近事件的根源尚有待于全党加以澄清，以便从中得出正确的解释和对现行政策有益的教訓。

从党在这个时期奉行的政策的后果及目前繼續奉行这种政策的情况来看，确实迫切需要针对党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展开一場大辯論。

遺憾的是，党的領導机构錯誤地、不光彩地长期拒絕进行这场迫切需要的辯論。作为共产党人，我們认为，我們有責任毫不迟疑地搜集一切我們所了解的与这一段历史有关材料。

我們并不隱諱做这件事所碰到的困难和麻煩，但是，这同严重的失职可能造成的損失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沒有在党内、在我国人民面前并同我国人民一起使历史路綫正常发展，我們的《法国共产党史》往往仅限于叙事紀年，重述客观事实。

历史家們可能十分正确地指責本书只是“罗列和叙述事实”。但是这比沒有好得多，比单独一个領導人写的小說体裁的自传好得多，比一些犯了錯誤的領導人为了掩飾和繼續奉行一

种灾难性的政策而写的一些掺假的历史宣传著作好得多。

我們对于共产党员讀者有足够的信任，我們认为，当他們了解事实真象，按照我們共产党人的理論对这些事实进行評断，并据此同苏联兄弟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大胆討論先后加以对照以后，是会得出正确解释的……

此外，尽管我們做了一些防范，这本叙述事实真象的书还是难免会落到反共分子的手中。甚至会有人为这种泄露提供方便，并把由此而引起的造謠中伤归罪于我們。但是，对于党來說，这些危险同永久說謊和由此而造成的意志消沉比起来，是无要紧要的。

讀者同志是会区别共产党的自我批評同本书所譴責的反动分子的造謠誣蔑的。

敌人曾經从赫魯曉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斯大林的錯誤及斯大林个人迷信产生的后果所做的报告中“断章取义”，企图攻击共产主义。这种敌对宣传所带来的害处同自我批評和糾正錯誤所起的进步作用相比，是无足輕重的。

我們依靠这种經驗，向讀者同志說出了他們有权利了解的事实真象，以便将来共同避免重犯过去的錯誤。

即使在許多同志可能认为是煽动性的暴露的东西中，我們也决不会說出敌人所不知道的和敌人在自己的警察局档案里可能持有一些证据的任何东西。我們让全体共产党人了解确切的事实，就能防止敌人乘机加以利用。

后面的叙述表明，从整体來說，党在最混乱和最危急的时期对于共产主义原則及其历史使命是忠实的。

当縮小了的、与党隔絕和脫离群众的領導机构发出一些既不符合当时的政治局势又不符合实际可能性的指示的时候，党，

从基层到最高领导，最终还是纠正了错误，并且在实际行动中采取了比较正确的路线。

一些同党失去联系的干部和自发地重新组织起来的党员，在敌人占领的最初几个月里往往主动地组织宣传工作，进行反法西斯的活动。

后面将有机会研究的一些违背原则的指示只下达到几个人的手里，而且一般地说，这些人对这些指示是有保留地接受并且怀疑这些指示的真实性的。正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共产党人才成为抵抗运动的积极组织者，从而也就成了法西斯迫害的对象。

为党的敌人所利用、违背共产主义原则和群众愿望的活动，肯定是有一些的。对此负有责任的并不是那些遵守纪律的执行者，而应该归咎于那些领导人，他们不懂得在必然要签订的德苏条约所造成的困难局面面前，把正确保卫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堡垒同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情感结合起来。

让我们在这篇必要的前言里，向那些不顾强迫人们遵守纪律的最高命令的威胁而减轻了不正确指示的消极作用，宣传了正确的口号，并且从1940年起就使法国共产党站在抵抗运动最前列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者致敬。

第一章

往事一瞥

納粹軍隊闖入法國領土時，共產黨處於非法地位已經九個月了。

1939年9月26日达拉第下令解散共產黨以後，黨員們在秘密重建黨的鬥爭中，以受迫害的重大代價取得了一定的經驗。他們在政治上依靠了後來在抵抗運動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工人階級。

但是，在戰爭開始乃至納粹占領初期，黨還遠沒有重新鞏固地組織起來，也還遠沒有取得不可缺少的思想上和行動上的一致。

1939年8月23日德蘇條約的簽訂，使得幾年來一貫從事反法西斯宣傳、反法西斯行動、反對希特勒德國侵略陰謀的群眾運動和強烈譴責“慕尼黑投降”的全黨不知所措。

我們在第一卷里已經指出這個條約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蘇聯既然看出了帝國主義國家要把希特勒的衝擊力量引向蘇聯邊境的陰謀，它就不能不決定簽訂這個條約。

但从表面上看，這個條約確是反乎常情的，是與法國無產階級當中已經發展起來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情緒相反的，以致許多黨員、許多經過考驗的優秀的共產主義者對這個條約茫然不解。

黨的中央領導仍然像過去常有的情形那樣，“等待”共產國際的“正式解釋”，對於受敵人宣傳影響而迷失方向的黨員並沒有進行任何武裝思想的工作。它甚至連最起碼的解釋還沒有做

就貿然宣布評論德蘇條約的法理根據的人是叛徒。其實，我們的黨員對蘇聯有不可動搖的信任，作一些最起碼的解釋就能使他們很多人感到滿意。

《人道報》和《今晚報》不作任何論證，只是說一些對黨員毫無幫助的空洞詞句。

1939年8月25日的《人道報》上有這樣一句話：“蘇聯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行動有助於鞏固普遍和平。”

《今晚報》則提出：“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公布使戰爭後退了。”

黨領導的失職情況更加嚴重，因為《人道報》、《今晚報》和各省的共產黨報紙在發表上述空洞聲明的第二天就遭到查封，這本來是可以預見到的。

不久，黨員們就只能靠一些小冊子和非正規的聯繫來得到一些消息。

領導機構的失職越嚴重，它作出的指示越混亂，黨員們對德蘇條約的想法也就越迷惘。黨對於這個條約所採取的立場同全黨以前所極力宣傳的立場顯然是矛盾的。

早在幾個月以前，1937年阿爾代表大會所選出的政治局^①就宣布過，對希特勒的威脅應該採取堅定的政策。

多列士曾宣稱：“當希特勒拍桌子的时候，不應該躲到桌子底下去。”馬爾梯在嘲笑那些竟然在慕尼黑同希特勒握手言歡的人時毫不含糊地說：“如果德國沒有鐵、銅、橡膠和石油，就不能夠作戰！”（見1939年5月2日《人道報》）

我們還記得希特勒借口取得通過波蘭領土到但澤港的權利

① 莫里斯·多列士、雅克·杜克洛、安德烈·馬爾梯、馬賽爾·吉頓、皮埃爾·色馬爾、阿爾圖爾·腊梅特、加斯頓·蒙穆索、呂西安·米多耳和弗朗索瓦·皮佑。

而向华沙发出最后通牒的情况。

1939年7月5日，加布里埃·佩里在《人道报》上写道：“德国现在打算强占但泽以便控制波兰，正如它过去想强占苏台德地区以便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纳粹侵略开始了，波兰有权进行正当的自卫。”

8月17日，馬尼昂写道：“我們要警惕！有人企图通过牺牲波兰再一次出卖法国。必須挫敗这个罪恶的计划。”

为了劝告人們对纳粹德国的領土要求采取强硬政策，《人道报》在德苏条約签字的前夕发表社論說：“不許慕尼黑事件重演！”

德苏条約批准后的第二天，希特勒的军队侵入了波兰。这样一来，过去說的什么德苏条約是拯救和平的保证，呼吁什么“抓住希特勒的魔掌”阻止他强占波兰等等，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法国和英国保证在波兰受到希特勒侵略的情况下支持波兰的时候，党领导的立場从加布里埃·佩里的下述言論中可以看出來：

“問題并不只是关系到波兰。英国和法国所以保障波兰的領土完整，是由于它們把波兰的領土完整看成是英法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1939年4月3日《人道报》）

德苏条約签字以后，莫里斯·多列士在共产党議会党团的會議上還說过：

“如果希特勒胆敢不顾一切发动战争的話，他應該清楚，他将会遭到有共产党人站在最前列的、保卫国家安全和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团結一致的法国人民的反击。

“因此，我們党贊成政府为保障我国边境所采取的各种措施。”（1939年8月26日《人道报》——合法出版的最后一号。）

8月27日，共产党的报刊遭到查封，于是馬賽尔·加香給萊

翁·勃魯姆写了一封信，以传单形式散发出去，信中說：

勃魯姆同志：

“我們不是說話不算数的。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共产党要明确而忠实地表明自己的立場。

“我們宣布：必須團結全体法国人来击退法西斯战争贩子。

“任何情况都不能使團結在我們周围的几十万工人放弃这种立場。他們决不会作出任何損害保卫国家所必不可少的法国團結的行动。”

9月2日，共产党議會党团就前一天举行的會議发表一项公报，肯定了这种立場：

“共产党議會党团在多列士主持下举行了會議，一致宣布：为捍卫国家的独立自由，为捍卫民主和文明的原則，全体共产党人决心毫不动摇地站在抵抗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最前列。共产党人过去是并且永远是坚决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面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狂妄侵略，共产党人将是我国民主和独立的最坚决的保卫者。”

从这个时期到1939年9月26日，尽管党的报纸都被查封了，但党仍然有举行會議和散发传单的权利。

当苏联軍队也开进波兰的时候，代表分散的政治局发言的小领导核心本来可以更充分地解释波兰反动政府和參謀部是怎样逃亡而把整个波兰让給納粹侵略者的，但是它并没有这样做。

当时苏联派軍队进占那时属于波兰而实际上是1921年波兰从被迫妥协的年轻的苏联手中夺去的地区，是合情合理的。苏联这样做不但縮小了希特勒对波兰的侵略，同时还为它自己以后的防御建立了一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防护地带。

連丘吉尔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从苏联的民族利益出发，苏联的战略进军是正确的。

法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作这样人们可以理解的解释，而是只发表了一篇声明，祝贺“红军解放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时抗議“法国政府没有征詢議会的意見就向德国宣战”^①。

这篇声明同党以前发表的声明显然相互矛盾。它給党的敌人和党以前在人民陣綫里的同盟者（麤集在政府里的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和其他“自由主义分子”）提供了对党进行激烈指責的机会或方便条件。

人們到处大事宣传，說什么法国共产党贊成納粹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法国共产党背弃了它过去为保卫波兰所进行的宣传！法国共产党放弃了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之下，一些立場不穩的分子，像党的書記馬賽尔·吉頓、克拉馬姆、卡普龙等人，便乘机脫离了党，投向敌人的陣营，同时还指責苏联成了希特勒的同謀。

还有一些共产党員也脫离了党，这些人不一定是叛徒或变节者，而仅仅是因为他們当时不知何去何从……

以前人們宣布法国声援波兰是正确的，1939年9月2日还投票贊成政府提出的万一需要在軍事上帮助波兰抵抗希特勒时的战争預算，并且声明，如果必須打这样一場战争的話，共产党人将站在最前列，現在却写道：“不值得支持土豪劣紳的波兰。”不譴責希特勒侵略了人們过去号召保卫的这个国家，反而不作任何說明就对苏联占領这个国家部分地区的行动表示祝贺。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受到迫害威胁、报刊被查封、随后又被宣布为非法的党的队伍产生某些动摇，有什么奇怪呢？

1939年9月6日，党领导通过馬賽尔·加香写給全体参議員的一封公开信再次宣布：“劳动人民的首要义务是服从政府为

① 1939年9月18日的声明。

打倒希特勒所采取的軍事措施。”信中明确地提到：“以莫里斯·多列士为首的共产党議員已經回到部队里去了。”

但是，莫里斯·多列士在取得駐布魯塞爾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意之后，于1939年10月4日在安納省肖尼（他是在这里參軍的）离开了軍隊，同让納特·維美徐、馬尔达·代律莫和阿尔图尔·腊梅特一起到了比利时。

1939年10月20日，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有名的答英国共产党報紙《工人日报》記者問，只是已經无法引用它的全文：

“法国的反动势力，达拉第和那些背叛社会党的头目，对于我们揭露他們把帝国主义的战争目的强加在法国人民头上这件事，表现出同样的凶暴。

“人們为了保护資本家的保险柜，已經杀了一些人，而且准备还要杀更多的人。”

坚决反对希特勒的任何侵略，“为了保卫文明”同法西斯的威胁“进行坚决的斗争”，都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种突然的改变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强加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些指示所引起的，他們想使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完全服从苏联的策略，而不考虑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

在斯大林看来，既然同德国签订了临时条約，并且希望尽可能延长这个条約的有效期限从而贏得時間，那就决不能再展开反希特勒宣传，而必須在努力削弱德国的同时，也努力削弱同德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其他資本主义国家。

总书记立即毫不犹豫地听从了这些指示，并且不考虑对党将产生什么危害就表现出与他前不久要求人們支持的立場截然相反的立場。

当时的一篇文件对于党不得不突然改变立場起了特殊作用。

这就是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曾经印成传单和小册子，1939年下半年秘密出版的《布尔什维主义手册》第一期也转载了这篇报告^①。

这个文件的标题是《莫洛托夫的讲话》，其中有以下几段：

“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久前我们还采用的而且很多人已经用惯了的某些旧说法，现在显然过时，以后也不能再使用了。

“在估计欧洲新的政治局势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才不致犯严重的错误。大家知道，像‘侵略’、‘侵略者’这些概念在最近几个月都有了新的具体内容和新的含义。不难理解，对于这类概念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根据三、四个月以前的那种含义来使用了。

“如果今天谈起欧洲的大国，那么德国是一个渴望尽快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国家，而不久前宣称反对侵略的英法则赞成继续进行战争、反对缔结和约的国家。正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现在角色换了。

“英法政府企图以向波兰承担义务为借口来为自己新采取的立场辩护，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大家知道，根本谈不上复兴旧波兰。

“英法对德作战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它们曾经发誓要复兴旧波兰，当然也不是因为它们把决心捍卫民主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英法统治集团对德作战有着其他更为现实的原因。

“这些原因不是属于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而主要是属于殖民国家的基本物质利益方面。

^① 根据《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这篇报告秘密印行了五万份。其中有两万份是《布尔什维主义手册》。

“英法目前对德作战的真正原因，是害怕德国对它們那些殖民領地怀有野心，因为随着凡尔賽条約的破产，德国的力量最近大大地加强了。

“害怕失去世界霸权的心理迫使英法統治者采取了对德国发动战争的政策。由此可見，只要是肯于正視现实而不是閉着眼睛不看现实的人，就会清楚地看出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是誰需要这场爭夺世界霸权的战争。显然，工人阶级是不需要的。”

在結束說明共产国际所强加的改变方針的原因以前，有必要引述莫洛托夫这篇讲话中专门談“苏德新关系”的一段，以便更好地衡量已經接受的妥协的程度：

“我們来談談苏联本身所处的国际形势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們同德国的关系，正如我已經談过的那样，已經得到根本改善。

“在这方面，事情已經朝着加强友好关系、展开实际合作、在政治上支持德国寻求和平的愿望的方向发展了。

“我們始終认为，一个强大的德国是巩固欧洲和平的必要条件。”

* * *

客观地研究一下这篇文件就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是为了稳住希特勒这个伙伴才說了一些叫他听起来感到順耳的話，因为他們考虑到，这个伙伴早晚总会变成自己的敌人。苏联采取这种态度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种态度符合苏联“爭取時間”的策略，并且可以延續簽訂德苏条約的精神（法英应对德苏条約的簽訂負主要責任）。

一个被迫进行地下活动的党，在宣布过它对法西斯主义的刻骨仇恨之后，在投票贊成同法西斯主义作战的預算并声明它

一定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之后，似乎不应该不向迷失方向的无产阶级队伍解释改变立场的深刻原因就机械地遵循当时苏联的立场并且突然宣传这种立场。

集体编写本书的作者认为，法国共产党当时可以通过对苏联的策略进行必要的解释而制定一个既考虑到自己以前所采取的立场又兼顾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绝对命令的方针。

莫里斯·多列士在决定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和抛出全面改变立场这个炸弹以前，如果先同所有未被捕的中央委员商量一下，肯定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并且可以避免一些损害。

第一卷中谈到的怎样被剥夺权利、被监禁和受审的共产党委员和数以百计的党员，都是这种专断的领导方法的受害者。

共产党委员给爱德华·赫里欧的信（这封信由阿尔图尔·腊梅特从共产国际驻比利时的机构带来，由弗洛里蒙·邦特副署），除了声明改变立场以外，其写作手法也极为拙劣。^①

信中写的“法国将面临〔纳粹德国的〕各种和平建议”这句话，无疑是执行莫洛托夫所确定的路线，然而这恰恰给了反共分子以宣传共产党委员“卖身投靠希特勒”的机会，说共产党人早就知道希特勒的意图，说他们不等希特勒提出建议就表示支持。

因此，由分散的中央委员会缩减成的领导核心，在希特勒德国面前自动走上了彻头彻尾和平主义的道路，并且竭力为这种做法辩护。这个领导核心甚至又搬出了李卜克内西在他那个时代勇敢地提出来的口号：“敌人就在我们国内！”盲目地把它应用到1939—1940年的战争上，好像这是一场英法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战争；而且当纳粹军队已经盘踞在法国领土上的时候，还是这

① 见本书中译本第1卷第210—211页。

样喊。

这种改变使得一贯信守列宁主义原则的共产主义战士陷入困难的、有时是戏剧性的境地，因为改变了的立场同他们多年来在与他们有紧密联系的群众中所捍卫的立场完全背道而驰。

敌人的宣传机器所进行的猛烈宣传使人早就预感到将要宣布共产党不受议会的法律保护，于是党成立了一个秘密机构，准备转入地下活动。不幸的是，人们不加识别地竟把这项责任委托给了根据莫里斯·多列士的提议提升为党组织书记的实际上成为最高警察局代理人的马塞尔·吉顿。吉顿不久以后的叛党，使得一切准备工作都落空了。地下干部的新负责人莫里斯·特雷昂不得不从头做起。特雷昂在阿尔图尔·达利戴的协助之下重新成立了一个秘密机构，用以代替被破坏了的组织。按照预定计划转入地下的地区委员会^①为数极少。

除了发生几起叛党事件之外，由于人们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合法主义思想和对被罢免的议员的作用抱有幻想，还先后招致了达拉第一雷诺政府和貝当政府的镇压。

有人向那些想要隐藏起来的党员说，不久就会恢复合法活动，还有人硬说他们应该呆在自己的家里。有人建议市议员们要在罢免他们的市镇里进行公开宣传。因此，巴黎地区有一些共产党市长就冒着被捕的危险举行公众集会。圣乔治新镇的亨利·雅宁就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轻率举动呢？毫无疑问，人民阵线时期的积极策略和在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使某些党员又产生或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机会主义倾向和麻痹性。但是，合法主义还有另外的原因。当时莫里斯·多列士和那些追随他的人都认

^① 这个时期，党的省组织称作地区委员会。